

有承載並勾起民眾學習或是賦與行動意義的具體事物，包括寺廟或宗祠中陳列展示的「忠、孝、節、烈」圖畫或塑像），但我相信，作者已運用的「制度化」理論仍可能有更多的發揮空間。作者已經考慮了中古「選舉制度」對「士大夫社會」的作用（頁250），也曾留意諸如閻鴻中所分析的漢代「長者」地方政治運作，然而，如何讓「士大夫社會」與「芸芸眾生」社會之間有更多層次可供分析，似乎仍有可為。如果分析傳統中國「儒教國家」在歷史上如何制度化的過程時，能區分出「組織、制度」甚或是「組織、法律、意識形態」等不同的層次，則也可能使我們對傳統中國政治史的結構與變遷，增加更多的整體性理解。

邱澎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x，505頁。

本書是李伯重多年來有關江南經濟史研究的論文集，可能正因如此，在編輯上，有許多章節沒有進行系統的鋪排，只能被放到全書的後半部（在篇幅上佔去全書的一半），作為附錄。較有系統的描述是全書的前半部份，可以分為三個課題：一是考察江南經濟發展在13、14世紀間是否發生過轉折；二是討論明清江南的水稻生產；三是探求同時期的人口變化。三個課題構成全書的主要理論框架，積極地挑戰多年以來流行於學術界的江南經濟模式。

李伯重挑戰的理論，主要是來自伊懋可（Mark Elvin）在1973年出版的《中國過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伊懋可在此書中宏觀地勾畫了過去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指出中國在8至12世紀曾出現了翻天覆地的經濟革命，無論是農業技術、水路交通、貨幣信貸、市場架構或科學技術方面均有長足的發展；不過他強調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在12世紀後逐漸停頓下來，這種停滯的狀況一直持續，是明清中國不能步向工業化的主因。在解釋上，伊懋可運用了「邊際報酬遞減律」。他以棉紡織業的發展為例，指出江南在13世紀仍是全國最富庶，而且是工業技術最先進的地區。但是到了16世紀，江南人口已經非常稠密，不少良好的土地已經種植稻米，因而使得它在棉花供應上，不得不依賴山東。到了17世紀後期，當山東已經逐步發展自己的棉織工業，江南對棉花的需求只好依賴更遠的滿州地區。因此從18世

紀末開始，江南的經濟發展，已陷於一個所謂「高水準的平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一方面是原料的缺乏導致生產成本的上漲，另一方面則是勞動力因人口增加而充裕，使得社會對那些能減輕勞力的機器不感到急切需求。此時中國經濟雖有發展，但只是量的擴大，缺乏質(技術)的提升(Mark Elvin, 1973)。對於伊懋可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描述，李伯重綜合為「唐宋變革」和「明清停滯」兩大內容，前者是關於8至12世紀的經濟革命，後者則是對中國在16至18世紀間不能走向工業化的描述。

李伯重開宗明義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歷史，並不存在13、14世紀的轉折，原因是伊懋可所謂的8至12世紀的經濟革命，特別是農業革命，實際上只是一個虛象。伊懋可所謂的農業革命，主要是指下列四個範疇：(1)農民靠新知識和工具，並廣泛地以糞、河泥和石灰作肥料，改善土壤；(2)引入早熟和耐旱的谷物品種，使一塊土地可有兩造的收成；(3)水利和灌溉技術得到革新；(4)商業的發展產生了農業商品化。李伯重在書中利用不少農書的資料重新審視了由宋末到明清的江南農業技術和經營方式。他認為唐、宋、元、明、清的江南農業發展是一個緩慢而持續的過程。唐宋的農業確實是有所發展，但視之為「革命」則是誇張。譬如以稻麥輪作為中心的一年二作複種制，終宋一朝，只在江南西部的河谷丘陵地區得到實施；而在江南地區的主體部份江南平原，佔主導地位的仍為水稻一年一作甚至二年一作。直至明清之際，這種複種制方在江南平原上取得支配性地位。稻麥複種制的發展證明，中國經濟既沒有13、14世紀的轉折，也不存在所謂明清農業經濟停滯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李伯重要挑戰的不單單是伊懋可，而且是深深影響着伊懋可、何炳棣等一代中國人口學學者的背後理論——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1765-1834)人口論中的中國模式。馬爾薩斯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內，有少許內容是論及當時中國的。他認為每個國家均根據其獨有的文化來處理人口增長和糧食供應的不協調問題。英國人是比較有理性的，即使是低下階層的勞工，一想到多了孩子會造成生活困難，便不會衝動地隨便結婚。但是，許多歐洲以外的國家的人民，包括中國人，均缺乏這種理性。這些國家在歷史上時常出現人口超出糧食供應的情況。要解決這種不協調的問題，只能靠天然的調節，亦即戰爭、瘟疫和飢荒。除了這個理論外，馬爾薩斯亦深信當時的中國雖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但幾乎全部已被耕種，且每年收成兩次，糧食供應不大可能再有大幅增長。因此可以認為，中國的人口已達到飽和而停滯的狀態。

李伯重承認明清時期江南人口有上升的趨勢，他指出從1400到1850的四百多年間，江南人口由900萬增至3,600萬人。但是他並不同意這3,600萬的人口已對江南的社會經濟構成壓力，或者已出現「邊際報酬遞減」。他要論證明清時期的江南人，與同時期的英國人一樣，在人口增長和糧食供應的協調問題上，具有同樣的理性。

爲了證明明清江南人在生育上具有理性的態度，本書設法論證明清溺嬰問題的嚴重化、節婦和貞女的增加、男同性戀的流行、以及養老觀念由養兒轉變爲儲錢等等。另外，透過藥物和非藥物進行節育的流行、結婚費用的高昂和愈來愈多人離家經商等社會風尚，均有效地使到江南地區婦女受孕的機會減少。簡單來說，在明清時期，江南人盡力「控制（人口）增長，以保富裕」。

不過，在分析這些社會現象的時候，我們必須清楚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是否真的如李氏所說的要「控制增長，以保富裕」？筆者並非否定中國人會以理性的態度來處理日常生活問題，事實上溺嬰的動機往往就是包含了他們對金錢回報的憂慮。但是，除理性之外，中國人的行爲還被其傳統文化宗教等觀念所主宰，爲甚麼在溺嬰的問題上遭殃的多是女嬰？爲甚麼許多家庭即使如何窮困也要生一個男丁？若我們只視江南人爲「經濟人」（economic man），這類問題是無法回答的。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重男輕女的觀念持久不衰，繁衍男丁當然是所謂「養兒防老」，但「養兒防老」的意義，絕不只是如李氏所云使父母在晚年得到生活上的照顧，它還包括使父母死後生活在另一世界時得到供養。自古以來，對祖先神主牌的供奉，只有兒子才能擔當。如果明清時期江南人真的普遍有獨身的趨勢，他們應該有一套辦法來處理神主牌問題（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會共建佛堂居住和安放神主牌，只要佛堂繼續有自梳女加入，神主牌的供奉便不成問題，有關討論可參見蕭鳳霞的論著）；或者他們已經發展一套新宇宙觀，像許多現代人一樣不再相信死後的世界，但是這兩個轉變，似乎並不會在明清時期的江南普遍存在。如果是這樣的話，李氏所述的江南社會風尚，其背後的動機還是來自傳統文化的，而非古典經濟學家所謂的理性。

如果江南人並非通過節育來解決人口問題，那麼這個地區如何餵飽年年增加的人口？也許我們應該注意本書的〈「天」、「地」、「人」的變化與明清江南的水稻生產〉一章。在本章中，李氏認爲除了溫和的天氣（特別是18世紀）外，人爲的努力是促成稻米畝產提高的要素。這些人爲的努力，包括了（1）進行水利建設和農田改良；（2）調整作物佈局，將不適宜種稻之

地改種棉、桑等經濟作物；（3）多施肥料，增進地力；（4）改進水稻栽培技術；（5）推廣最佳種植制度等等。

李伯重的研究，可說為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角度。但是，如果清中葉江南地區沒有人口壓力，當代中國邁向現代化的絆腳石又會是甚麼？

張瑞威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Globalizing South China.* By CAROLYN CARTIER. Oxford: Blackwell, 2001. xvi, 320 pp.**

Carolyn Cartier所著*Globalizing South China*（《全球化的華南》）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叢書之一。作為一部試圖「重寫華南區域形成史」的著作，作者嘗試打破以往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的學科畛域，力求融合多樣性的世界觀。將華南「全球化」（“globalizing” south China）的意義在於，通過特定情勢下文化、政治和經濟形式的交叉去理解區域形成的複雜性；在文化綜合體和社會動態的空間聯繫所構成的長期歷史中看待區域社會的內在邏輯；將「全球化」放在空間的歷史文化實踐運作和政治經濟進程轉型的語境中去把握。作者認為，無視全球化的「全球語境」和「地區化內涵」，往往落入西方中心觀的桎梏，而無法在「世界性倫理」中體現地區化內涵；而忽視區域形成中空間聯繫的動態變換所體現的全球化涵義，則會導致20世紀80、90年代地理學及其相關領域把「地方和全球」（the local and the global）兩個概念截然對立甚至割裂開來的研究取向。本書的旨趣在於，通過華南區域形成的變異進程和地方經驗的空間實踐來理解全球化的地方性知識，又在全球化的地區社會聯繫和不平衡性中去描繪華南區域動態的表像的多層空間。將「華南」和「全球化」並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如作者所引David Harvey所述，旨在憑藉重現地理學的廣闊知識來理解文明社會，打破對舊康德主義哲學中關於歷史學（敘述）和地理學（空間秩序）以及地理學（客觀物質條件的外部世界）和人類學（主觀的內部世界）這兩對二元的機械區分，重建那些在不同時空尺度下本來就互相關聯着的動態的結構過程。

全書除序言和結語外的八章分為兩大部分，前四章為華南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後四章為當代視野下的考察，每一章均融合歷史與當代材料作為區域「語境」地理（contextual geographies）的敘述脈絡。第一章開篇言明